

# 思想对抗的时代：1980年代的中国政治

祁 建 民

The Age of Ideological Confliction: Chinese Politics in 1980s

Jianmin Qi

1980年代，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对立、交锋最为激烈的时代，围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自由问题争论不休。但是，这种争论由于缺乏冷静、客观和宽容的讨论环境，最终却以流血结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但是在政治上却坚持中共一党领导体制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说中共在经济社会领域导入了资本主义的做法，但是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却坚决抵制资本主义。为此，一些人主张，要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对政治体制也要进行彻底改革，实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主宪政制度。面对这种政治领域的改革要求，中共在1980年代多次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其实这种运动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进行，到了80年代这种思想政治运动更加激烈，批《苦恋》，反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和全盘西化，直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达到高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时代政治运动的主线，在中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还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坚持一党领导，否定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理论体系。此后，在很长时期里，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的讨论都噤若寒蝉。直到2006年，出现了新“西山会议”事件和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标志着政治性议论的逐渐复苏。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虽然经济改革越来越深入，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大的进展。由于在政治上实行“稳定压倒一切”，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确实现了长足进展。

## 一、“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在“文革”刚刚结束以后，以重新评价毛泽东和中共历史、要求实行民主和平反冤案为中心内容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就开始在北京出现，其中以西单一段墙壁最为集中，人们称之为西单民主墙。这期间民间集会以及报刊也陆续出现。随着这种对于建国以来历史反思的深化和要求民主呼声的高涨，有人对于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甚至提出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种种悲剧都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一党领导体制所造成的。人们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怀疑和不满不断高涨，这已经影响到中共领导的稳定性。特别是党内也开始有人直接批判毛泽东的理论及其政策，这“引起了高层人士的惊恐和恼怒，认为是走得太远了。”<sup>1</sup>在1979年1月18日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王若水等对于毛泽东进行严厉批判，胡乔木则忧心忡忡，认为“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否

<sup>1</sup> 王若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定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sup>2</sup>与此有同感的邓小平便委托胡起草一个讲话以制止这种趋势。结果，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了“中国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他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四项根本前提，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或“四个坚持”的由来。这是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中在政治思想方面划定的红线。会后，邓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评‘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和我们分道扬镳了。”<sup>3</sup>随着“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文革”之后出现的思想解放高潮就此结束。

在此前后中共对于以西单民主墙为阵地的民运人士也采取了措施，逮捕了魏京生、任晓町等人，下令大字报必须以真名贴到月坛公园的指定地方。到1980年8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反右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兴盛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民间集会和大字报活动即被取缔。毛泽东时代的那种群众运动的基本形式被取消，这一方面对于防止出现文革时的社会动乱有效，但是，这也就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基本限定在了经济领域。这期间，国际上1980年夏天爆发的波兰工人大罢工对中共刺激很大。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开会讨论吸取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陈云提出防止“翻船”的警告。他说，有人认为中国不会出波兰事件，这种估计为时过早。他提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经济工作搞不好，对人民的实际困难，我们不能逐步认真加以解决，广大群众不满，可能爆发波兰事件。二就是宣传工作。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搞得不好，不是引导人民向前看，不是引导人民团结起来搞四化，任听那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自由泛滥，也可能诱发波兰事件。<sup>4</sup>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对舆论的控制。

## 二、电影《苦恋》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出

1981年发生的对于电影《苦恋》的批判，标志着中共在文艺领域对于那种有可能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利的文学作品开始重视和批判。军队作家白桦写出的电影剧本《苦恋》，深刻揭露“文革”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出电影《太阳和人》。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1981年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这个剧本，无论作者动机如何，看过之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哪里去了。胡乔木也说，这部影片极力向人们宣扬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四人帮’就是中国共产党，似乎十年内乱就是社会主义，似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和幸福，而只有愚昧和迷信，党和人民没有对‘四人帮’进行斗争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因而在中国看不到一点光明，一点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是惨遭迫害和屈辱，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于美国，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知识分子自由生活的命运才是令人羡慕的。这种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sup>5</sup>此后，报刊上对于这类揭露建国以来对人残酷迫害，其背后暗含着否定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伤痕文学”也开始批判。

从此之后，中共将那些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实行西方民主自由的言行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1982年，胡乔木撰文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说明，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里的首要的自由，就是资本家进行雇佣剥削的自由，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自由。这

<sup>2</sup>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 十二个春秋（1975—1987）》征求意见稿，2005年，第207—207页。

<sup>3</sup> 同上，第209页。

<sup>4</sup> 王若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sup>5</sup> 胡乔木《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他》，《红旗》杂志，1982年第8期。

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最本质的东西，其他各种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竞选自由，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自由等等，归根到底都是由这种自由派生出来，并为它服务的。而当前我们社会上出现的这种思潮，它的特征正是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自由，想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竞选制、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一定范围内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思想行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索贿受贿、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和投靠，等等，搬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而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sup>6</sup>

### 三、人道主义与“精神污染”

1983年发动的批判异化论、人道主义和“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在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更深层次批判那些脱离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可能会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怀疑的论点。

“文革”结束不久，著名记者刘宾雁就提出要提倡人道主义，他说：“文革”中“排除人性的结果，并不是出现了神性，而是泛滥起兽性。”此后，报刊上出现许多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对此中共有人表示担心，据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就说，现在宣传人道主义，将来有人造反，就会打人道主义的旗帜，起来杀共产党。到那时，我们队伍里就会有人跟着走。<sup>7</sup>但是，1983年3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大会上却作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的长篇报告。他提出由于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反过来滥用权力，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权力的异化。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甚至在“文革”时期把批判人道主义变成为“四人帮”实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做法的论据。他呼吁现在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

不过，当时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反对周扬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主张异化论会造成青年人否定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一样，宣传人道主义会引起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他认为周的讲话有不足之处，因为周“只讲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消灭了剥削，这是极大的人道主义的胜利。如果不着重提一下，就好像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为人道主义。”他后来还说，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sup>8</sup>邓小平支持胡的看法。邓批评周扬说，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邓还说，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邓要求得组织点文章。需要有分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主管宣传的邓力群则在会上系统批判王若水的人道主义，他说：在王看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人道主义各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好多家。这样讲，实际是为各种错误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敞开大门，使他们在我们国内、党内合法存在，自由泛滥，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sup>9</sup>胡乔木组织人写出长文，

<sup>6</sup>同上。

<sup>7</sup>王若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sup>8</sup>同上，1997年，第47、73页。

<sup>9</sup>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征求意见稿，2005年，第440页。

批判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红旗》杂志上有文章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都认为，人性是抽象的、不变的，资本主义制度符合这种人的本性，因而是永恒的存在。其实，他们不过是把一种具体人性的表现一例如资产阶级的自私，说成是一切人所固有的天性罢了。”<sup>10</sup> 从阶级论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是坚持阶级性，还是要回归普遍的人性，这是3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争论的核心问题。因为中共的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建立在阶级论基础之上的。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要与世界接轨，就要突破传统阶级论的观点，承认普遍的人性观念和普世价值。

共产党要不要讲人性，接不接受普世价值，其实中共内部也有一些不同意见。1986年，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原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不赞成在文件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有毛病的。我们不应该把民主、自由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加以反对，应该对它作历史的分析。民主、自由在资本主义是假的，在我们要使它成为真的。现在还是不敢讲话。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陆也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他说，为什么要分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呢？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一些。这样听得醒目。<sup>11</sup> 不过，胡耀邦在征求过邓小平的意见之后，主张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其理由是，这个提法的含义已经有了明确的界说，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保留这个提法，不会导致过火斗争。但是，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最后表决这个文件时，陆定一仍然发言要求去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并且得到掌声，万里也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但余秋里和杨尚昆则反对。主席台上的常委也议论纷纷。这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是极为罕见的。这时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决支持。他还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把我们将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他还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10年20年。由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写入决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成为邓小平时代政治斗争的主题。如同毛泽东时代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政治目标一样，邓小平时代则是不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只不过邓没有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一直强调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有时还提出“不争论”，目的是保证改革开放的大局，发展生产力。因为邓一直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对于社会主义和中共领导的不满就会减少，政局才能稳固。

1987年第3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掌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武器》评论员文章。该文提出：“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当前政治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1987年5月，《红旗》杂志理论教育编辑室编写了《中央文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述的学习提要》一书。书中进一步明确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涵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它特定的含义，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它的特征正是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想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等，全盘‘引进’到或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而从原则上否定、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其实质，就是要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书中还说：“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策略就是吸收资本主义的

<sup>10</sup> 王锐生《有没有抽象的人性》，《红旗》杂志，1983年第22期。

<sup>11</sup> 龚育之《我所知道的陆定一》，龚育之《党史札记 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一些长处来建设社会主义。书中还说：“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了。”书中强调，现在的“反对精神污染是几年来思想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由此展开，但是，邓小平听取了赵紫阳、万里等人的意见，没有将这一运动引入到经济、科技等领域，保证了改革大局。

#### 四、政改与学潮

1986年6月，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时间围绕政治体制改革出现许多议论。一些人主张政改要同经改一样，全面、大胆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已经开始付诸实践，在一些地方人大选举甚至成立学生会时，大学生们要求实行自由选举、民主公开，抵制以往暗箱操作选举的做法，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其实，邓小平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是一种行政效率上的改革，并不是要改变中共的领导体制。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就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sup>12</sup>1986年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他的重点在于消除官僚主义，对于发展民主的表述则比较抽象。

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却对政治体制改革抱有很大的期待，甚至主张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例如作家王若望，著名记者刘宾雁和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等就提出要实行多党制，全盘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1986年底，中国科技大学所在的安徽合肥市进行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大学生对于这种官办的走过场式的选举不满，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12月5日，合肥一些大学的大学生举行游行，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和“打倒官僚主义”等口号。很快，学潮扩大到上海、北京、南京和天津等城市。对于大规模的学潮，胡耀邦主张不采用强硬措施，而是通过“沟通”和“对话”方式解决。但是这受到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元老们的反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元老参加的民主生活会专门批评胡耀邦，认为学潮的发生是胡几年来对自由化姑息的结果，胡被迫下台。其后，王若望，刘宾雁和方励之等人也被开除党籍。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出发点实际上是一致的，经济改革为了发展生产力，采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目标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邓小平务实政策的集中体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巩固党的领导。所以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是完全否定的。邓坚持认为三权分立的体制会造成议而不决、影响效率。这与他政治改革的目标不符。但是，邓又不同意把政治运动推广到经济领域中，害怕影响到经济发展。在反对精神污染的时候，万里主张在农村不搞清污，方毅也说“我们科技战线不搞清污。”赵紫阳反对将清污引入经济领域，这些都得到邓的点头，他不认为经济领域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时，赵紫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十分大胆，对此，邓小平完全支持。但是对于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却十分保守，据赵紫阳回忆说：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他（指邓小平一笔者）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一些话，说三权

<sup>12</sup> 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sup>13</sup> 赵紫阳的回忆说明了邓小平对政改的基本态度。

## 五、资本主义与“全盘西化”

1980年代，国门初开，中国人大开眼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文明对当时中国人造成巨大冲击。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民间意识中，羡慕、追求甚至崇拜西方的观念大为盛行。对此，1987年前后，中共报刊开展了对“全盘西化”观点的批判。因为西化就意味着要搞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红旗》杂志首先发表文章说：“现在提出‘全盘西化’论的，虽然只是个别人，但它却代表了一种社会思潮，而且事关重大，它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文章首先回顾了1930年代中国国内关于“全盘西化”的论争过程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全盘西化的含义从来就是全部照搬西洋文化”；第二，“全盘西化的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论据很多，但首要一条是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三，“在近代中国，‘全盘西化’论的代表是一向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适”；第四，“30年代‘全盘西化’论尽管得到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但中国并未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文章认为，“全盘西化”是一个非科学的口号，西方并不是什么都好。“全盘西化的实质是要把我国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文章还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论证了“全盘西化的论据不能成立。”<sup>14</sup>

中共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论证了“全盘西化”没有根据。第一，从国内来说“全盘西化”，“首先就要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政治制度，建立反对党，轮流坐庄。可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试问，除了共产党，又有哪个力量能够领导中国来对内对外，来保持国家的安定、发展、前进？”第二，“历史上的一切，莫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如果指望中国走私有制道路，全盘西化，‘化’到和当初的美国、英国和法国一样，那也是痴心妄想。”中国不可能走掠夺殖民地的道路。第三，“目前西方未来学有所谓悲观派与乐观派的争论。但不管哪一派，都惊呼资本主义处在大变动的前夜。”<sup>15</sup> 刘认为搞“全盘西化”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资本主义也在变化。

## 六、六四：思想对决的后果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顶峰就是“六四”事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发展成为暴力行动。1989年4月15日，因为主张用温和手段解决大学生游行问题而被以姑息资产阶级自由化罪名赶下台的胡耀邦因病去世。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认为胡的下台是一场冤案，几年来对于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不满的大学生和知识界借胡的去世，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游行、静坐活动。4月15日，在北京的一些大学出现了悼念胡的大字报。4月17日，北京的大学生在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鲜花时，高呼“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和“打倒贪官污吏，清除腐败现象”等口号。4月18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向政府提出7点要求，表达了这场学潮的诉求，主要内容是：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取消违反宪法的

<sup>13</sup> 同上，2009年，第232页。

<sup>14</sup> 周隆宾《“全盘西化”论的过去和现在》，《红旗》杂志1987年第8期。

<sup>15</sup> 《望周刊》记者《“全盘西化”的由来和为什么行不通——历史学家刘大年谈》，《瞭望周刊》1987年第8、9期。

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客观报道这次活动。对于学生的抗议活动，邓小平在听取杨尚昆、李鹏的报告后，把学潮定性为“动乱”，表示要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中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发表之后，情况没有转变，却出现了抗议活动升级，并向全国各大城市蔓延。5月13日有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抗议活动受到北京市民的广泛支持，局势恶化。5月19日，北京市宣布戒严。在此前后，总书记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被事实上解职。6月4日，军队武力开进北京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终于由文斗变成武斗。由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告一段落。

“六四”之后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势力由此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激进势力被清除之后，中国民主化要求便从体制外转移到体制内，由追求西方的政治制度改为要对现有制度加以改造和完善，对于“三权分立”这种典型的西方政治体制很少有人再再提。经过六、七年之后，在中国以追求“普世价值”的形式又开始了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问题的重新讨论。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是经过对“六四”事件之后，中国人对于实行民主的要求，已经把追求一种特定的民主实现形式和民主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区别开来。1980年代的民主运动很多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作为唯一目标和蓝本，认为在中国搞民主也必须是如此。但是，现在首先是把“民主”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来认识。为了实现民主这种普遍价值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并不把“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这种具体民主形式看作是民主化的唯一或最基本内容。这时的讨论，气氛相对缓和，环境也逐渐宽松。这可以说是对1980年代思想对抗所造成后果的一种反思。